

图书馆史书写中的“大历史”和“小历史”

——以清末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为视角*

姚乐野 刘春玉 任家乐

摘 要 研究范式决定了历史书写,也决定了研究的成果。本文以清末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文献为视角,探讨运用新的研究范式重新书写和整理图书馆史。传统“大历史观”范式下,清末民国图书馆史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以思辨性的历史书写为主;二是精英书写;三是注重图书馆“宏观历史”的书写;四是主要关注学术流变、学人圈的交流和互动。而公众史学等新思潮注重社会史、微观史或者说“小历史”的研究。新的研究范式必然带来对档案、口述史、回忆录等史料的重视;新的研究范式将会有新的视野,并深化图书馆史的研究。图书馆史研究应将重点放在属下群体的研究,寻求从“草根阶层”而不是从“精英阶层”,从社会化的角度而不是从学术流变的角度,来梳理和研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从而拓宽图书馆史研究的视野。表1。参考文献19。

关键词 图书馆史 历史书写 研究范式 “大历史” “小历史” 档案资料

分类号 G259.29

“Macrohistory” and “Microhistory” in the Writing of Library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brary Archives in the Periods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an of China

YAO Leye, LIU Chunyu & REN Jiale

ABSTRACT

Research paradigms determine the ways the history is written and the consequent research products. By analyzing the present historiography paradigms in library history,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 this study proposes new paradigms based on library archives in the periods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an China.

Current historiography has three paradigms: cognition, identification and recognition, represented respectively by progressive history emerging after the Enlightenment, ethnohistory and post-modern history. The mainstream library historiography paradigms are cognition and identification, which focus on the grand, the significant, and the macrohistory. While recognition history, as a newly-emerging paradigm, highlights the often neglected or suppressed “others”. Typical schools of recognition history include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micro-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etc. The ideas of subjective literature and objective literature are introduced to classify library history materials based on whether they are created by scholars to promote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末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整理与研究”(编号:15ZDB128)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paper is an outcome of the key project “Archiving and Research on Library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49” (No. 15ZDB128)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姚乐野, Email: leyeyao@scu.edu.cn, ORCID: 0000-0002-9676-7470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YAO Leye, Email: leyeyao@scu.edu.cn, ORCID: 0000-0002-9676-7470)

thinking or recorded facts. This study examines present library literature and finds that most publications are concerned about academic history of library as a science and library elites' history.

Current research and historiography on library history have the following features and limitations: first, the majority of them are about scholarly thinking. Second, they are written by elites. Third, they emphasize the macro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Fourth, they focus on academic 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scholars. Library archives basically are concerned about social history of libraries rather than academic history, and make it possible to study libr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aspects and micro aspects, and enable research to touch on new areas and deepen present study. This study proposes to examine library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tom level librarians rather than elites, from social history rather than academic history.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hree research paradigm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his study points out stereotypes and weaknesses in present library history. Two cases, the National Roosevelt Library Planning Committee and the Boone Library School's operation in Chongqing, are introduced to demon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post-modern theories.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paradigm will improve present research and intensify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library history. 1 tab. 19 refs.

KEY WORDS

Library history. Historiography. Research pattern. Macrohistory. Microhistory. Archives.

自托马斯·库恩提出范式理论以后,这个简便又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范式理论的核心是一种公认的,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假说、理论、方法、定义的模式,也可以说是一种思维习惯的描述。范式理论可以用来阐释历史考察背后的哲学思想,包括历史书写问题。“历史书写”是历史学研究中的用语,这个词源于西方,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历史记注”,该词实际涵盖了中文的“历史记录”与“历史编纂”的双重意义,这是一个容易引起混淆的概念。研究完成后写出来的专书,也可以称为历史书写;如作为动词使用,可称为“书写历史”,那实际上是在实践或是创造历史^[1]。由于历史书写常常述评结合,很多时候不易区分是叙述还是研究,而且这种区分也并无必要;换言之,历史书写的过程是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并存的过程。由于范式的不同,不同的历史书写会产生不同的研究成果。

现有图书馆史材料的整理状况是:一、学界对于民国时期图书馆界公开出版的著作、期刊等已有相当深入的挖掘与整理,从最近十余年

的出版情况来看,基本上已将这一时期图书馆界出版物整理完竣,期刊的整理最为完善,并且现有研究基本以此为基础。二、对档案、口述史、地方志的整理及利用尚处于初始阶段,因为保存分散、难以查找等原因,这些数量庞大的文献尚难构成学界研究的基础。研究材料限制了研究视野,使得现有民国时期图书馆史研究的公开文献总体上属于学术历史书写及精英历史书写。本文结合清末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资料调查,探讨如何运用新的研究范式,拓宽图书馆史的研究视野。认为应将重点放在属下群体的研究,寻求从“草根阶层”而不是从“精英阶层”,从社会化的角度而不是从学术流变的角度来梳理和研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

1 传统范式——图书馆史书写中的“大历史”

现有历史书写有三种范式: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与承认性的历史。三种范式分别以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史学、民族国家史学与

后现代史学为代表。以进步史学为代表的认知性的历史书写,追求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以民族国家史学为代表的认同性的历史书写,最高目的是服务于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以新文化史、微观史、妇女史等为代表的承认性的历史书写,强调的是被忽略、被抑制的他者在历史书写中的在场^[2]。以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为代表的研究范式一直是图书馆史书写的主流,可以用黄仁宇注重宏观变化和整体结构的“大历史观”来概括。认知性研究范式注重图书馆史“大树”的主干,紧紧把握图书馆史研究的所谓主旋律。如严文郁所著《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一书,分背景、萌芽时期、成长时期、抗战及复员时期等来显示图书馆事业的进步轨迹,又分图书馆立法、教育、研究、团体与国际关系来讨论图书馆事业的不同面相。而另一种范式,认同性的历史则倾向以国家、民族为讨论范围,将认知性历史研究的结果服务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如程焕文所著《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贯穿的一根主线就是图书馆学中国化问题,既体现了认知性范式“进步”“客观”的特点,又体现了建立“他者”和“我者”的认同性历史范式的特点。两种范式如此熟稔地运用于图书馆史的研究并不奇怪,因为在同时期及之后的大量历史书写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并促成了这两种范式的运用。

从文献来源来说可分为公开文献和非公开文献两类:前者主要是指公开出版的图书、论文等,具有统一的书号、刊号,可以通过市场流通;而后者主要是指并非公开流通,而存在利用限制的文献,如档案、未刊稿、内部刊物、调查报告、访谈记录,等等,一般不具有商品属性。

如果以图书馆史文献的内容是否以“思想创作”为主进行分类,又可以分为主观性文献和客观性文献两类。

一是主观性文献汇编:期刊类文献主要以《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图书馆学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以下简称为“三大

刊”)为代表,以及前后四次结集出版的《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2003),及其续编(2005)、三编(2006)、四编(2013),《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报刊资料分类汇编·儿童图书馆卷》(2014),等等;著作类文献有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创作的各种作品,解放后撰写的回忆录及学术著作等,如严文郁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1983),《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1999),《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2000),《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选集》(2003),《杜定友文集》(2012),《沈祖荣集》(2016),等等,还有王余光、范凡将民国时期著名图书馆学人马宗荣、杨昭愬、杜定友、刘国钧等人的著作汇编成集的《清末民国图书馆史料汇编》(2014),及其续编(2016)等。笔者将其归入主观性材料,主要是因为这些材料大多是经“创作”产生,是当时图书馆学人思想创造的成果。当然,这些刊物很多也具有客观描述的成分,例如三大刊对图书馆事件的报道,比如中华图书馆协会历届年会的报道等,但总体以思想创造为特征。

二是客观性文献汇编,主要是政府发布的政策文件,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制定的规章制度,馆史、馆务报告,图书馆和图书馆人编制的索引目录,等等。较有影响的有李钟履的《图书馆学论文索引》(1959),《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1982),《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1919—1949)》(1985),《中国图书馆学史料丛刊:清末民国图书馆史料汇编》(2014),等等。从已出版的有关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文献汇编资料来看,已经有一些内容出自档案资料,比如1992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其前言中说明:“《汇编》的大部分资料选自北京图书馆档案,所缺资料从公开出版的报刊中补充。”^[3]《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及近年出版的《清末民国图书馆史料续编》也有不少内容来自于档案,但是来源杂乱、零散,仅为公开出版文献的一个补充。

现有图书馆史研究文献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以“思想创作”为特点产生的论文、著述,是具有大量思辨性质的历史书写;二是精英书写,这些作者,不论是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人,还是1949年以后的回忆录作者、研究者,基本可以归为图书馆学人、图书馆馆长、主任等,是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少数精英;而这一小众往往也自认为或被认为是图书馆事业的代表者;三是这些材料关注的领域是图书馆史“大树”的主干:著名机构、著名学人、著名事件,等等,一般是图书馆事业的核心和骨架;四是主要关注学术领域的发展与进步、学人圈交流和互动,由于这一群体大多身处图书馆业的上层,有不少人接受过图书馆学高等教育,他们所关注的也多是学术交流和研究。

2 传统范式形成的原因及不足

传统范式的形成有其必然性。20世纪初中国图书馆事业尚处于少数社会精英及西方传教士唤醒的阶段,虽从业人员日增,然而并未与其他服务业划清界限,整个行业还没有形成有别于其他职业的专有知识及技能,仅从称谓的混乱即有所见,“书籍每日由协理轮查一次,如有损坏遗失等情,须由管书人追根赔补。”^{[4]102}“本楼立总理一人、监督一人、司书二人、司事一人、门丁一人、庖丁一人、杂役一人。”^{[4]114}直到1910年,官方文件《学部奏拟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第十五条,其中有“图书馆管理员均应访求遗书及版本,由馆员随时购买,以广搜罗。”^{[4]109}这时才开始出现“图书馆管理员”的提法。早期图书馆员所学习的范本主要来自中国人在西方的游记,以及少数从日本转折而来的西方图书馆学知识。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海外留学归来以及本土科班出身的图书馆人如杜定友、刘国钧、沈祖荣、袁同礼等,以及文化界的重要人物梁启超、林语堂、王云五等,对于形成图书馆的专有知识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同时期出现的图书馆刊物及图书馆协会中树立起了

旗帜,起到了核心的作用,也在图书馆事业的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人数众多的普通图书馆员群体,则很少涉足图书馆的核心知识领域,是图书馆事业中发声较少的群体。本文借用“下属群体”(Subaltern)这个概念来描述这个群体,即“无论从阶级、种姓、年龄、社会性别、职务还是任何别的意义上说,都具有社会中处于从属、下等、次要地位的一般特性。”^[5]而当时后现代史学尚未形成,传统史学占据统治地位,研究范式上还关注不到这一群体。

三大刊的编辑者与作者基本代表了图书馆学的精英群体,常常既是“记录者”,亦是“被记录者”,这些人的文章牢牢占据了期刊的绝大部分版面。而从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馆方面的专著来看,亦具有“学术化”的浓厚意味,因此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公开文献总体上属于学术历史书写的范畴。由于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基础与美国不同,是由上而下的新风尚的形成,缺少群众基础,也缺少下属群体书写历史的习惯,导致很难听到来自他们的声音。

因此,如果只是研究图书馆学术的演进变化和精英群体的交流活动,那么现有的材料尚足以应付。然而从承认性史学的角度来看,重视研究个体不同的微观世界,承认那些被忽略了的“他者”的存在,注意普通图书馆员在历史书写中的在场,以及一些社会史关注的问题,比如基层图书馆的生存和发展,基层图书馆与民众的关系,知识在经由图书馆传递给民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图书馆员的经济生活、职业动态、教育培训细节,比如考试、招生、就业等,图书馆员职业的性别趋势,社会认识对图书馆职业接受程度,职业心理等等微观或宏观的问题,等等,现有的公开文献很难提供支撑。图书馆的公益性质决定了图书馆是与政府行为结合相当紧密的行业,图书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图书馆“大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而这种关系并不是研究若干政府法律法规文件就可以解答的,但至今未见相关研究,估计也是因为思维受局限或者材料不足。

3 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的现状 & 特点

综上所述,扩大史料的收集范围是解决现有研究范式缺陷、形成新的研究范式的重要一环。学界注意到了这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学界对于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史的文献整理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对民国时期不同类型的图书馆事业文献进行整理,代表性的立项有王余光的《图书出版与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研究》(编号:96CTQ005),姚乐野的《清末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整理与研究》(编号:15ZDB128),马春晖的《晚清、民国时期地方志图书馆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编号:16BTQ034),分别涉及出版物、档案、地方志三种类型的文献,涉及公开文献和非公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反映了学界对于不同类型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重视,至于其他各类民国图书馆史、思想史、教育史等方面的专项研究也有不少,都程度不同地涉及了图书馆史

料的整理与利用,此处不再赘述。

我国图书馆事业诞生发展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出现的图书馆多是国家图书馆、省级图书馆、教会图书馆,以及由藏书楼改变而来的私人图书馆,到三、四十年代,县级公共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室)大量增加。民国建立以后,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图书馆事业档案存世较少,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局势稍微稳定,档案数量开始大量增加。民国图书馆档案多集中于20世纪30—40年代,分国家、省级、地方、私立四个层次的内容,涉及人事、薪资、政府训令、馆务活动、教育培训、图书馆与外界交往等多个方面,除政府档案以外,教会档案也值得关注。

笔者调研了全国14家收藏有民国图书馆事业档案的不同类型和层级的档案馆,总结了现存民国时期图书馆档案的特点,归纳如下。

一是体量庞大但散存各地。民国时期图书馆档案分散于全国各地档案馆,可资利用的档案数量相当丰富,一些普通的地方档案馆也有不少值得关注和深入整理的档案资料(见表1)。

表1 14家档案馆图书馆档案收藏整理情况

档案馆名称	所藏图书馆档案数量	保存状态
第二历史档案馆	18 110 页	数字化
北京市档案馆	6 000 余页	数字化
天津市档案馆	30 000 余页	数字化
上海市档案馆	10 000 余页	数字化
重庆市档案馆	15 000 余页	数字化
贵州省档案馆	10 000 余页	纸质
四川省档案馆	10 000 余页	数字化
广东省档案馆	15 000 余页	数字化
湖北省档案馆	20 000 余页	数字化
湖南省档案馆	6 100 页	纸质
武汉大学档案馆	50 000 余页	纸质
北京大学档案馆	10 000 余页	纸质
成都市档案馆	8 000 余页	数字化
成都市双流区档案馆	10 000 余页	纸质

二是蕴含信息对于图书馆史研究极具价值,但开发利用不足。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我们时常惊讶于档案所展示信息的重要价值。双流区档案馆所藏民国时期双流县图书馆档案,展示了一个基层图书馆工作的鲜活例子,而学界关于基层图书馆的系统研究基本还是空白。重庆档案馆所藏完整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档案,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当时国立图书馆的运作情况,对其“筹而不立”背后所涉及的复杂纠葛有了发现,而现有论文对此语焉不详,也是研究的真空;至于从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的有关1947年中美援引《佛尔伯莱法案》合作开展图书馆学教育的框架协议,文华图专内迁时期教职人员职称评定的重要文件,金陵大学申请开设图书馆学专修科,以及教育部的批文等珍贵信息,也是公开文献所未见的。本课题组以档案为基础的研究成果《民国时期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高级图书管理科办学研究》《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函授教育研究》填补了学界研究的空白。这些都说明档案史料价值极高,大大拓展了研究的视野,补充现有研究的不足。由于档案利用不便,当前的图书馆史研究直接利用档案文献的文章数量很少。

三是以馆务活动、图书馆管理为特点,从内容上看,民国档案大多体现为图书馆馆务活动的记载,诸如向政府部门呈请开办图书馆的函件、政府部门的批示、图书馆的月度、年度工作报告、薪资收入、个人简历、教育培训等内容,都具有明显的公务性质,这些信息在正式出版物中很少看见。因此,档案记录多以馆务活动为线索,其历史书写多采用客观、中性的记述,相当大的篇幅反映了下属群体的“在场”,是一种承认性的历史书写,对于当前加强基层图书馆、普通图书馆员群体的研究,采用社会史、微观史研究的方法大有裨益。由于档案材料是原始的,未经“创作”^①的第一手材料,研究者不易受到前人思维惯性的影响,往往会有新的发现。而图书馆本身又是与政府联系非常紧密的行

业,因此档案材料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4 承认性历史范式的采用

承认性历史范式依托后现代史学而产生。后现代史学认为历史并不一定是连续的、整体的、一元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方面的、多元的结构,因此也就存在从不同角度进行历史书写的必要。后现代史学认为历史也不是少数作者可以塑造的,而是强调对文本本身的解读,而文本的来源更加广泛,一切具有分析价值的材料都可以作为文本解读,这样就动摇了传统史学注重进步性、客观性、规律性,讲究整体性、主干性的研究特点,降低了作者的地位,促成了微观史学、大众史学的兴起。一些经典著作如《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马丁·盖尔归来》等,均是从属下群体中的凡人故事来展示这个群体所具有的某些特征。这些著作所依据的材料多样,法国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就是利用宗教裁判所的档案,完成了对一个农村社会生活、思想、习俗的考察。这些以小见大,从微观世界延伸到宏观叙事的方法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因此,承认性历史范式的运用其实与传统史学研究范式并不矛盾,而是拓展了学界的思维,让那些以前根本不引起注意的现象成为新的研究目标。在关注历史的每一片“树叶”的同时发现树叶之间的规律性,从而也为认知性历史范式和认同性历史范式提供更多的佐证。由于当前图书馆史精英书写、精英表述的特点,笔者认为尤应将重点放在属下群体的研究,这不仅弥补传统图书馆史研究的缺陷,也丰富了我们图书馆史的总体认识。

以下以重庆档案馆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档案为例,来阐述承认性研究范式的运用。从传统图书馆史书写范式来看,现存有关罗斯

^① 此处所说“创作”主要是指思想创造,不包括档案的形成者有意造假或歪曲的“创作”情况。

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的档案绝大多数是令人沮丧的,基本为主流研究范式所无从采用。里面包含着这样一些文件:严文郁与友人蒋复璁、汪长炳等关于国民政府迟迟不正式设立罗斯福图书馆的焦虑及安慰的内容,严文郁的许多校友走马灯式地赴任而后又匆匆辞职的记录,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与自来水公司、电话公司因为水费问题、电话架设问题争执不休的数十封信件,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工作人员因为要出公差开具的通行证,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与警察局关于添设警察保卫的争执,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被盗的处理,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关于社会人员在外冒名撞骗的说明,外界请托来馆任事的函件,为应对物价飞涨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采取的相应措施,政府机构经常下发的与图书馆工作毫无关系的学习文件,工作人员履历,等等。

然而,如果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说,这些材料提供了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笔者发现了多达近百页的有关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和重庆市自来水公司、重庆市公用局、重庆市政府之间关于水价的往来公文、函件,内容涉及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希望援引机关学校特价用水前例,享受优待水价。从现存的档案看,这些公文、函件时间跨度较长,从1946年12月26日筹委会致函重庆市政府嘱托援引机关学校特价用水用电收费^[6]起至1948年9月11日重庆市政府以市府市秘二字第<2364>号训令^[7]同意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以1/3水价计费止,接近两年的时间^①。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以机关学校特价用水用电先例为由,申请享受优待水价,而自来水公司以“优待条例所定优待范围并未包括文化社教团体在内,该会既为教部所设立,但其性质仍为一文化事业团体而非政府机关,当然不在优待之列”为由予以拒绝^[8];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继而提出“前国立中央图书馆

与现重庆市立图书馆亦均荣贵公司惠允优待”^[9]为由再请优待。从往来公文、函件之多,历时之长,到市公用局、市政府的介入,可以合理地推测出当时重庆市政府的社会控制力是很薄弱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国民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并未将包括图书馆在内的社教团体与学校、机关并列,图书馆始终游离于主流教育领域之外,也反映出国民政府对图书馆的一种漠视态度。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屡次函请享受优待水价,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有先例的存在,还有一个原因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是为维持图书馆运行的不得已之举。1947年8月19日,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在给自来水公司的函件中提到自来水已停流三日^[10]。1948年8月,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在给重庆市政府的函件中提到“惟近月来以国库支绌,对于本会经常费并未依照物价之增长而加多,本月份全部经常费已不够缴付水费,其他应支费用更了无着落”^[11]。从这些档案记录可以看出当时维持图书馆事业的艰辛,而这些内容在现有研究范式里是看不到的。

仍以图书馆学、档案学教育为例,内迁前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以精英教育为主。根据采访毛坤之子毛相骞先生的笔录,文华图专内迁前是培养图书馆馆长级别人才的学校,是一种精英式的教育。内迁前文华图专毕业生大多任职国内著名高校及重要图书馆馆长、主任,在业界拥有良好的声誉。内迁到重庆以后,精英教育开始向大众教育发展,不仅招生门槛降低,招生人数大为扩张,还设置了新的档案学专业,这一趋势到了抗战复员武汉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丁道凡先生整理的《文华图专各届毕业同学录》(初稿)以及武汉大学档案馆所藏该校档案可见,该校至内迁及复员以后学生数量有明显的增长。

① 实际的时间跨度可能更长,从档案中看,罗斯福图书馆筹委会应是先致函自来水公司,未果,再致函重庆市公用局,仍未果,最后致函市政府,请市政府转饬公用局转饬自来水公司实行优待水价。所以实际的起始时间应早于1946年12月26日。

再以重庆档案馆、武汉大学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文华图专档案为例,从档案来看,1940年文华图专正式设立档案学专业,档案课程增加为档案经营法、档案编目、档案分类、档案行政学、档案实习、中国档案论、西洋档案论、档案专题研究八门,档案学成为与图书馆学并重的教育领域。图书馆学课程进一步拆分,比如中西编目法拆分为中文编目法、西文编目法、编目专题研究、特种目录编制法四门课程。各种图书馆研究拆分为大学图书馆学、中学图书馆学、公共图书馆学。图书馆学建筑从图书馆行政中拆分出来,成为单独的一门课程,增设图书馆学概论、图书馆讲演等新课程。

除档案学类课程的大量增加外,文华图专尝试涉足的其他领域还包括文秘学、出版学、博物馆学、考古学等文科项目,诸如书评、公文研究、公务管理、公文体式、政府组织概要、特种博物馆学、考古学、簿记与会计、社会科学概论、自然科学概论、出版调查与研究、儿童读物研究、成人读物研究、文哲概论、史地概论、学术讲演、社教工作、伦理学等二十余种新课程。1942年文华图专呈送给教育部备案的文件中就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变化。“教务之部,二、增设新课程:本学期拟添设史地概论、史料整理法、博物馆学通论等课目。史地概论一课全体学生必修。史料整理法、博物馆学通论二课档案科学生必修,图书科学生选修。”^[12]从学科设置、课程设置、学生数量等方面来考察,文华图专内迁期间表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而另一方面是,文华图专在渝期间师资力量急剧下滑,虽然沈祖荣努力延请,外籍教师没有一个前往重庆。从学术培养看,文华图专的研究刊物《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已经停刊,内迁及复员后文华图专毕业生在业界的声誉也远远不能与之前那些人数少而精的前辈相比。从教学环境来看,沈祖荣的儿子沈宝环说:“抗战时期文华图专在廖家花园的师生过的是克难式旧农村生活,不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两句话就可以充分形容的。”^[13]可见当时文华图专的学科设置和办学

与师资力量、教育环境不相适应,与战前更是形成巨大对比。

教务长汪长炳离开文华图专,前往新成立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担任图书博物馆学系主任就很能说明问题,“在汪教授立场,他觉得他是在扩充文华在图书馆界的影响力,而把社教学院的系看成文华的分校。”^[13]而实际上恐怕与汪长炳看淡文华图专未来的发展有关。沈祖荣为此召集毛坤、徐家麟、皮高品、汪应文开会,讨论教务长这一重要人选,居然“几个小时没有取得共识”,最后“毛师挺身而出,他说:‘你们都有困难,我来做教务长。’”^[13]可见文华图专已到了很窘迫的地步。那么文华图专在如此困难的境地为何反而扩张课程,扩大招生呢?这明显与当时的物质条件是相背离的。

这是因为新成立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如芒在背,对文华图专形成明显竞争优势。1941年8月在重庆璧山成立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旨在培养造就图书馆博物馆高级人员。当时,图书博物馆专业在国内大学及专科学校多设科办理,其有学系之设立,以社会教育学院为开端。图书博物馆学系是我国第一所国立本科学制的图书博物馆学系。”^[14]汪长炳离开文华图专后又先后拉走文华图专多位教师,如徐家麟、严文郁、黄元福等文华校友。

该系办学很像内迁前文华图专的翻版,学生素质较高,“奉教育部令将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及私立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社会教育学系2—4年级学生合并本院,于是本院遂完成大学之实质。”^[15]另一部分新生则由国内各省市教育厅局考选保送。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生待遇一律公费,学费与伙食费均免,并按月发给零用钱,每学期还发给一定数额的制服补助金,此外学院还设有各种奖学金,以鼓励学生勤奋学习与研究^[14]。该系第一届学生于1945年毕业,将直接与文华图专毕业生形成竞争。而此时文华图专应教育部的要求,入学门槛已经降到高中毕业水平,在重庆期间再未开设过本科,教育水平

也不能与国家支持的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相比。

对于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的兴起与文华图专的渐渐落后,沈祖荣的失落与危机感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甚至办学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沈祖荣开辟新的专业,增设新的课程,增加招生人数等逆势举措也就可以理解了。

档案中一篇产生于1946年的文件《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募集基金启事》,真实反映了沈祖荣期待战后复兴发展文华图专的愿望。

“本校开办迄今历廿五载,毕业学生对于国内图书馆事业之推进与国际文化之沟通尚能胜任愉快,粗有成绩。民国三十年度起复蒙教育部核准添设档案专科,造就以科学方法管理档案之人才,服务各机关社团以为提高行政效率之助,虽事属创举亦深得各界好评。因此本校同人在各方人士鞭策与鼓励之下不敢不力图上进,以期对国家社会多有贡献,为加深学术研究,广为储备人材以应今后之建国需要计,拟乘此抗战胜利举国复员之会筹建独立学院。此事经征求有关当局与各地校友意见无不欢为赞许早观厥成,进行办法拟一面将学校由渝迁回武昌并添设博物馆科,一面勘定新校址建筑新校舍添置图书仪器约聘国内外专家。一俟人才设备大体就绪,再呈请升格为独立学院,图书档案博物三系鼎立,以为东亚唯一研究文献管理之最高学府。”^[16]

沈祖荣的压力还不限于此,1945年时,袁同礼就打算联合北京大学开设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拟由北大、故宫及北平图书馆组建研究部,其中高级班以自由讲学为主,初级班则为北大、故宫及北平图书馆在职人员的进修而设。研究部设在离北平图书馆不远的团城。”^[17]而真正的原因是袁同礼与蒋复璁渐生芥蒂,对沈祖荣与蒋复璁的联合有看法,担心因此断了北平图书馆馆员培训的路。王重民在向胡适说明傅斯

年不赞同在北大办图书系的理由时就说:“大概是顾虑到蒋复璁和袁先生个人的问题。文华经蒋之联络与鼓动,已树叛袁蒋旗帜,在这个当儿来办图书系,未免是助袁压蒋,或孟真先生有见及此,有意躲避蒋慰堂将来闹麻烦。”^[18]而最后的情况看,虽未办成研究部,然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却建成了。

档案中反映了沈祖荣力图建设高水平的“文献管理之最高学府”的愿望,大致来自以上两个原因,如果该计划得到最终落实,文华图专就能在办学规格上超越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继续保持 in 图书馆学,乃至新兴学科档案学、博物馆学等的教育领袖地位。因此,我们认为文华图专在重庆的办学扩张,以及复员后的振兴计划,与新的竞争者出现所带来的危机感有重要联系,这是公开出版物与档案相结合所产生的结论。

5 结语

图书馆史学者傅荣贤认为客观反映历史就要尊重历史事实,广泛收集并鉴别材料。这里存在着一个关于“真实”的价值指向,那就是努力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避免人为倾向的流露,反映出学者们对历史的尊重与敬畏^[19]。笔者认为图书馆史的研究还不只限于“求真”,因为“求真”乃是史学研究的最基本要求,而更为重要的是要拓宽眼界,寻找研究范式上的突破,从而带来新的观察角度。旧有注重“精英史”“学术史”的研究范式已暴露出许多不足,近年来学界越来越重视对于档案材料的挖掘和利用,除了寻求更为客观、多角度地观察问题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寻求从“草根阶层”而不是从“精英阶层”,从社会化的角度而不是从学术流变的角度来研究某种社会现象。由此应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产生更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钱茂伟. 小历史书写理论与方法的研究[J]. 学术研究, 2013(11): 108-115. (Qian Maowei. A study of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micro history writing[J]. Academic Research, 2013(11): 108-115.)
- [2] 张文涛. 区分历史书写的三种范式——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和承认性的历史[J]. 甘肃社会科学, 2014(4): 125-130. (Zhang Wentao. The comparison of three kinds of historical writing: about history of cognitive, recognition and recognition[J]. Gansu Social Sciences, 2014(4): 125-130.)
- [3] 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G].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1-2. (Management Research Commission of Beijing Library.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Beijing Library (1909-1949) [G]. Beijing: Bibliography & Archive Press, 1992: 1-2.)
- [4] 李希泌, 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2. (Li Ximi, Zhang Jiaohua. Ancient book collection of China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library in modern times (from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May Fourth Period)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 [5] 贺萧.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M]. 韩敏中, 盛宁,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22. (Hershatter G.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M].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6] 罗斯福图书馆筹委会致函重庆市政府嘱托机关学校特价用水用电收费(1946年12月26日)[A].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0670011000910000002-02.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Roosevelt Library writing to require Chongq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to charge for utilities by the special price for the schools set by local administrations (Dec. 26, 1946) [A]. The Municipal Archives of Chongqing. Record number: 00670011000910000002-02.)
- [7] 重庆市政府市府市秘二字第<2364>号训令(1948年9月11日)[A].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2240001005640000061000-19. (Directive No. 2364, from Secretariat of Chongq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Sept. 11, 1948) [A]. The Municipal Archives of Chongqing. Record Number: 02240001005640000061000-19.)
- [8] 为自来水公司呈复罗斯福图书馆用水予以优待碍难遵办函请查照由(1948年)[A].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1150001000260000088000-02. (The Chongqing Water Supply Company's reply that they could not follow the government directive to giv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the National Roosevelt Library (1948) [A]. The Municipal Archives of Chongqing. Record Number: 01150001000260000088000-02.)
- [9] 呈请自来水公司予以水费优待由(1948年)[A].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1150001000260000081000-06至07. (The Plann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Roosevelt Library's request to the Chongqing Water Supply Company for preferential treatment (1948) [A]. The Municipal Archives of Chongqing. Record Number: 0115000100026000-0081000-06 to 7).
- [10] 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致自来水公司函件(1947年8月19日)[A].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2240001004730000001000-04至05. (Letter for the Plann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Roosevelt Library to the Chongqing Water Supply Company (Aug. 19, 1947) [A]. The Municipal Archives of Chongqing. Record Number: 02240001004730000001000-04 to 05.)
- [11] 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致自来水公司函件(1947年)[A].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0530019020610000099000-01至02. (Letter for the Plann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Roosevelt Library to the Chongqing Water Supply Company (1947) [A]. The Municipal Archives of Chongqing. Record Number: 00530019020610000099000-01 to 02.)

- [12] 关于呈送本校民国二十九学年度校务行政计划与工作进度对照报告表及民国三十学年度校务行政计划及进度表的报告(1942年3月5日)[A].武汉大学档案,全宗号:7;年度:1946;案卷号:1-8;档号:7-1942-10.(School report on the comparison chart of executive plan & work schedule in 1940 and 1941 of the Republic China (March 5, 1942)[A]. Wuhan University Archives; Record group number 7; the year of 1946; Record serial number: 1-8; Record number: 7-1942-10.)
- [13] 沈宝环.序一[G]//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5.(Shen Baohuan. Preface (1) [G]//Selected works of Mao Kun on Library Science and Archive Science.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00:5.)
- [14] 彭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简史[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7(3):97-100.(Peng Fei.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Museum Science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Education College[J].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2007(3):97-100.)
- [15] 陈礼江.本院设立之旨趣及办理方针[J].教育与社会(创刊号),1942.(Chen Lijiang. Purport and management policy of the Institution [J]. Education and Society (first issue), 1942.)
- [16]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募集基金启事[A].私立武昌文华图专档案,第八七六号,全宗号:8;年度:1946年;案卷号:1946-8.(Announcement on fund raising by Boone Library School [A]. Archives of Boone Library School. No. 876. Total archive serial number: 8; the year of 1946; Case serial number: 1946-8.)
- [17]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台北胡适纪念馆.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G].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438.(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KU, Hu Shi Memorial Hall of Taipei. Letters between Hu Shi and Wang Chongmin [G].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Press;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2009:438.)
- [18] 周佳贵.王重民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始末[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3(4):83-88.(Zhou Jiagui. The process of Wang Zhongmin setting up the Library Science special course[J].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2013(4):83-88.)
- [19] 傅荣贤.中国古代图书馆史研究的叙述模式[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2):49-51.(Fu Rongxian.The narrative mode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brary's research[J].Shandong Library Quarterly,2008(2):49-51.)

姚乐野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 成都 610065。

刘春玉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65。

任家乐 成都大学特聘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106。

(收稿日期:2017-11-14)